第 55 卷 第 3 期
2018 年 5 月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55, No. 3
May 2018

抨击科举痛快淋漓
——《聊斋志异》主题一解

马 振 方
(北京大学 中文系 100871)

摘　要: 隋唐始行的科举制取代了维护世族特权的九品中正制,成为后来一千三百多年选拔官吏、人才的制度,某些弊病时有显露。至明代,特别是成化以后,八股取士形成定制,科举制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它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控制知识阶层思想的工具,同时也是士人进入官场的敲门砖。生长在清前期的蒲松龄,经过多次科举考试,既看到它的多种弊病和八股文的无用,同时又对只有八股文才能取得功名恋恋不舍。就是在这种矛盾心理状态下写出多篇批判科举的小说作品,成为《聊斋志异》的一个重要主题。其内容可分四个方面:嘲讽试官"黜佳士而进凡庸";揭露学官索贿,大僚卖官;展示考生受科举毒害种种可悲可笑的情状意态;讽喻八股取士"嗜痂成癖",没落无望。作品以奇异妄诞的意象达到表现的酣畅淋漓,讥刺鞭辟入里,堪称古体小说之最。

关键词: 科举;八股;试官;考生;抨击
中图分类号:I 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8)03-0054-06

自隋唐迄于清初,科举推行了一千多年,八股取士也施行了近三百年,而在《聊斋志异》之前,小说可谓汗牛充栋,却未得见揭露、抨击科举弊端的得力之作。沈既济《枕中记》等慨叹人生如梦,几乎不关科举。唯明初瞿佑撰《修文舍人传》,写"博学""英迈"之士夏颜,生不得志,死后被冥府任为修文舍人——"颜渊、卜商旧职也"①,说了几句人间可以"贿赂而通""门第而进"的愤懑之言,可算对科举弊端的不平之鸣。再过三百年,《聊斋志异》出,"文名藉甚"的作者蒲松龄走了大半生应考求官之路,却始终郁郁不得志,直到七十二岁才得了个岁贡生的功名,被授予儒学训导,有名无实。这种经历和遭际使他对混沌的明清科举具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和深切的感受,看到其中种种弊端及相关人物的形形色色。揭露这些弊端,显示各色人物,以神异奇幻之笔痛快淋漓地抨击科举,造成《聊斋志异》又一批意味迴永、光彩烂漫的名篇佳作,也是该书超越历代古体小说成为艺术高峰的重要因素。

一

明清两代,特别是明成化以后,以八股文取士乃成定制。八股文又称时文、时艺、制义,因题出自四书,又称四书文。较比以往,闱墨有两点特别要求:一是"代古人语气为之",即所谓"代圣贤立言";二是"体用排偶,谓之八股"②,"入手"后面的四段议论正文每段须有两股排比对偶文字,合共八股,类乎骈文。会作这类时文八股的人不一定有真才实学,有些中过举人、进士即所谓"两榜出身"的试官缺乏鉴别文章高下的能力。另一方面,像蒲松龄那样才华横溢的文学大家,应考的文章未必尽合八股要求,更难于超过专务时文八股的考生。这本是明清科举制度的腐朽性、落后性决定的,不只是个别试官的问题。蒲松龄身在考

收稿日期:2018-02-01
作者简介:马振方,男,辽宁省凌海市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① 《杜诗镜铨》卷十二《闻高常侍亡》于"何殊地下郎"下注曰:"王□(隐)《晋书》:苏韶仕中牟令,卒,韶伯父子节梦见韶言:颜回、卜商现在为修文郎。"

② 参见《明史》第 6 册,卷七十《选举二》,北京: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693 页。

生之中,认识自然受到限制,因而着力抨击昏聩的试官。当然,试官的昏聩也是科举制度腐朽的重要方面,对他们的抨击在客观上也是对科举的一种批判。《聊斋志异》中的这类作品特别引人入胜。作者利用丰富的生活经验和高超的艺术想象力翻出多种新花样,创造许多新形象。《贾奉雉》《司文郎》《于去恶》都是其中的代表作。

《贾奉雉》的主人公颇负才名,却屡试不第。一个姓郎的"秀才"说他的文章作得太高,试官欣赏不了,所以不能被录取,要他以后把文章降格,俯就试官,并指定两篇"贾氏鄙弃"之文"以为标准"。贾生不肯照做,也做不来,结果仍名落孙山。后来将落卷中一些"阘冗、泛滥、不可告人之句"戏缀成文,却被郎生以为"得之",并施展法术将它牢牢固定在贾的头脑里,入场后别的文章一概茫不记忆,只好将这篇东西写出充数,结果反倒高中。事后"又阅旧稿,一读一汗",深觉惭愧,无地自容,便随郎生入山学道去了。这样的郎生与法术自然是不存在的,由此生出的情节、画面、艺术内容带有明显的幻想性和讽喻性。但它又是真实的、深刻的,对现实科举的某种本质具有很强的表现力,不仅把科第的混沌、试官的昏聩显示得异常充分,也否定了八股文本身。郎说:"帘内诸官,皆以此等物事进身,恐不能因阅君文,另换一副眼睛肺肠也。"这说得何等明白,靠"此等物事"进身的不是个别试官,而是所有试官,"此等物事"不言而喻,就是让帘内诸官"皆"中进士的时文八股。作品将它贬为"阘冗、泛滥、不可告人之句",正是对八股文的极度讽刺,如明吴麟征称之为"龌龊八股",旋即"攒眉弃去"一般。① 本篇深刻之处,就在这段讥讽八股又讳言八股的奇妙之文。

结尾"异史氏曰"又附记明末一则传闻:崇祯年间,临川陈际泰应试,文章写成后,觉得做得太高了,无人"识得",就弃去另作,因而得中,"以故闱墨不及诸稿"。陈际泰,字大士,明末时文大家,"一日可二三十首,先后所作近万首,经生举业之富,无若际泰者";其文"流布海内,效学者皆早掇科第,而大士久而不遇",至崇祯三年"始举乡试",四年后六十八岁才得中进士。② 上述传闻或即为他晚年得中的非非之想,而降格为文以俯就试官与本篇贾生的做法何其相似乃尔?实际上,《贾奉雉》的奇幻情节正是这则传闻的艺术放大和神异化。

《司文郎》另是一种格局。考生不是一个,而是两个:王生和余杭生,同住报国寺中。王因后者狂悖,与之绝交。为有力地表现主题,作者还创造一个漂泊游魂宋生的形象。他文思敏捷,才华出众,余杭生逼他比试作文,被他两度打得大败;余杭拿出得意之作,又被他批得汗流满面。与此同时,宋与王生成了好友,对王的应试文章亦表赞许。这样,鬼魂宋生就像一台天平,把两个考生置诸两端,量出他们分量的轻重。结果王生落第,余杭生领荐,成了对试官的一种嘲讽。作品并未就此止步,又通过宋生拖出另一鬼魂——盲和尚。他是"前朝名家","最能知文",把文章烧化,他就能用鼻子嗅出高下优劣。焚古大家之文,他受之以心,连称"妙哉!"焚王生之文,他"受之以脾",说可以中试;焚余杭生之文,他"格格而不能下,强受之以鬲"。而试官看中的恰是后者。经过这样的铺陈、渲染,艺术夸张,大大增加了作品的讽刺性和感染力。作者还让奇人盲僧与余杭生打赌,从八九个试官的文中嗅出余杭生房师的劣作,结果让他"向壁大呕,下气如雷",因为其文"刺于鼻,棘于腹,膀胱所不能容,直自下部出矣。"对试官的揶揄、嘲讽至此达于极点,生动、诙谐、尖刻、别出心裁,令人看了拍手称快。

《于去恶》与上面两篇又有不同,不写人间科举,而写阴司开考,鬼士入闱,通过于去恶、方子晋两个鬼士与人间名士陶圣俞的交往、谈话,尽情地嘲讽阴间的试官,称他们为"乌吏鳖官""游神耗鬼",其中既有无目的师旷,又有爱钱成癖的和峤,实际是借阴司巧骂阳世,借历史人物嘲骂试官。由于不受人事的制约,笑骂更加自由,痛快。

---

① 《答倪鸿宝》,《吴忠节公遗集》卷二,明弘光刊本。

② 参见《明史》第 24 册,卷二八八本传,附艾南英传末,北京: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7403 页;又,章履仁辑《姓史人物考》卷四,乾隆二十年(1755)刊本。

上述作品虽然意在抨击试官,却不写具体的某一个人,更不涉及生活中的真人。另有一篇《何仙》别开生面,写了与作者同时的山东学政朱雯。朱雯,字复思,又字鬲三,浙江石门人,康熙三年进士①,三十年(1691)任山东学政,主持济南岁试,让手下的几个食客评文阅卷,结果将考生李忭的上好文章贬为四等,传为笑谈。作品借乩神何仙揭露此事,着力针砭"文宗不论文",同时挖苦评卷的食客,说他们"前世全无根气,大半饿鬼道中游魂,曾在黑暗狱中八百年,损其目之精气"。从这些用语可以看出,即使文场的真实人事,作者也要把他虚化,赋予浓厚的神异色彩,以便自由驰骋笔墨,恣情尽意地批斥试官和阅卷者流。赵伯陶君据蒲文《又投学宪呈》找到作者特别抨击朱雯的缘由:后者任上将蒲松龄所在县份淄川的科试选录名额"减去五分之二"(由五十余名减至三十五名)。此说有理。② 尽管如此,本篇的主要内容仍属实情。原因是所写的王瑞亭、李质君、朱雯、孙勷乃至考生李忭,均实有其人。而且其中三位都是进士出身的朝廷命官,不便随意而造。王瑞亭是蒲松龄的亲家,《蒲松龄集》有《答王瑞亭》信。李忭,道光二十年所刊《济南府志》卷四十三乾隆间"岁贡"列载其名,应即此人,入《何仙》时应还年轻。唯其所属县治有差,《何仙》谓为乐陵,《府志》则谓"陵县人"。然乐陵县时属山东武定府,其人不可能参加学政"案临济南"的岁试,"乐陵"应是"陵县"之误。就是乩神何仙,《长山县志》也有记述。由此可见,本篇内容多非子虚。只是被憎恶朱雯的蒲松龄借助乩神之笔夸大其词罢了。

二

明清的府、州、县学并不是教授生徒的学校,而是管理、考核生员(秀才)的衙门。教授、学正、教育、训导等学官时常借机索贿,以饱私囊。还有他们上面的学政,也通过种种手段勒索考生。蒲松龄做了几十年秀才,对学官的丑恶行径十分熟悉,在《饿鬼》《考弊司》等作品中不遗余力地予以抨击。《饿鬼》的主人公马永,"为人贪",又是无赖,人称"饿鬼"。前世帮助学官勒索生员,转世自己做了训导,"官数年,无一道义交",只在见到青蚨(钱)时才有笑容,"不则睫毛一寸长,棱棱若不相识"。生员小有过失,他就严刑拷打,"如治盗贼"。全篇无骨干情节,而以粗大笔触为反面主人公勾勒一幅特征鲜明的漫画像。"考弊司"就是学府衙门的代称,以幻想的阴司影射现实的人世。堂下大书"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司主却是"虎首人身"的"虚肚鬼王",秀才初见,要割大腿肉作见面礼,否则就得多行贿赂。以此讽喻学官的贪污纳贿,敲骨吸髓。主人公闻人生前世为虚肚鬼王的爷辈,秀才因而求其讲情,不料鬼王只认钱,不认爷,秀才无钱,照割不误,还说什么"此是成例,即父命所不敢承!"这种构想对学官的讥讽甚为尖刻。在现存的《聊斋志异》手稿本中,《考弊司》紧接《饿鬼》之后,"虚肚鬼王"与"饿鬼"的含义也大致相同。作者对贪鄙的学官深恶痛绝,一篇不足尽其意,又写一篇,互相补充,极尽发挥。思想大同小异,形象各有千秋。

封建时代,在以科举取士的同时,还准许用钱粮买官与功名,称为"捐纳"或"捐科"。早在秦始皇时就有纳粟拜官之法。后被历代统治者以不同的形式沿用下来。明清的捐纳之风尤其盛行。康熙年间,军饷短缺,不仅国子监依旧例大开捐科,一度连府、州、县学的生员资格也可以捐纳取得,称为例生、纳生、饷生或粟生。《何仙》篇写学使朱雯让粟生、例监参加阅卷,指的就是这类人。这种腐败的捐纳制度与怀才不遇的士子之间有着十分尖锐的矛盾,加上王公大僚贪赃枉法、卖官鬻爵,使上述矛盾更加尖锐,把仕途搞得乌烟瘴气。《聊斋志异》反映这种现实的代表作品是《僧术》和《公孙夏》。前者写黄生与某僧人交情甚厚,僧人要他将钱十千投入井中,代他贿赂"冥中主者"。黄生怕不灵,仅投一千,结果只得个贡士的前程。这是以阴间"开捐纳之科"影射人间同类情事,寓意是显而易见的。《公孙夏》是一篇神话化讽刺小说。保定某国学生准备入都捐个知县,

① 参见法式善《清秘述闻》卷十一,嘉庆四年(1799)刊本;阮元《两浙輶轩录补遗》卷二,嘉庆刊本。

② 参见《〈聊斋志异〉详注新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390 页。

不想病倒不起。忽来冥府贵官,自言“公孙夏,十一王子坐客”,谓某已寿尽,代谋城隍之职,死后可致“冥贵。”某遂“命出窖镪,市楮锭万提”,昼夜焚烧;又大买车马,一路炫耀,不想路遇关帝,谓其“市侩”,“褫去官服,笞五十”,逐还阳世。此乃抨击捐官、卖官之风的力作。国学生居然托鬼行贿,谋求阴间城隍之缺,希图死后做官享福。这种虚幻的夸张之笔,把捐科买官的实质显示得十分充分,异常鲜明。

篇末“异史氏曰”记述郭琇“再起总制荆楚”的一则传闻:赴任途中遇一国学生新任知县亦往赴任,驼车、驺从甚多,一路炫耀,被郭琇解职。仔细参详,可知《公孙夏》正文乃由郭琇轶事变化、生发而出,轶事乃是正文的本事。郭琇,字华野,“山东即墨人,康熙九年进士”,擢御史,不畏权贵,疏劾而罢大学士明珠等多人,官至左都御史。后以被诬罢归①。其再起则在康熙三十八年六月,为湖广总督,“令驰驿赴任”②。正文与轶事的买官主人公均为监生。轶事中的县令,正文改升冥官城隍。卖官的既为阴司贵官,处置此事的也就将郭琇这个“人中之神”改为真神关帝。两个买官者赴任炫耀如出一辙,关帝与郭琇斥之之言也相差无几。郭琇曰:“蕞尔一邑,何能养如许驺从?”关帝曰:“区区一郡,何直(值)得如此张皇?”轶事原无买官情事,正文将其神异化,大写十一皇子出面为贵官标卖城隍之缺,以影射世间此等丑事。世间处分炫耀县令,最多就是罢职为民;关帝处置就大不然,虽说“干进罪小”,还是重笞五十,“臀肉几脱”,以解作者与百姓对此等辈凭钱加官作威作福、仗势欺人的怨气。

三

隋唐兴起的科举考试制度取代了以往维护世族特权的九品中正制,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学校教育和社会文化都相应得到发展和提高,对知识阶层更是不小的激励和鼓舞,所以长期成为培养和选拔人才的制度。明清实行“代圣贤立言”的八股文以后,情况有了很大变化。时文完全脱离实际,既非学问,更不实用,只是博取功名的“敲门砖”。万千考生博取不到功名,就百无一用,百无聊赖,强烈的功名观念化作愁肠百结的情怀,精神苦闷、抑郁是必然的。这是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心灵的广泛腐蚀和深刻影响。《聊斋》中多篇作品,将落第书生的功名观念和悲苦心理写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有力地揭示了这种腐蚀和影响。

《叶生》主人公“文章词赋冠绝当时”,却长期“困于名场”。后得新来知县丁乘鹤的赏识与提拔,以科试头名取得应举的资格,而乡试的结果“依然杀羽”。这对叶生的打击极大,以至“形销骨立”,郁郁而死。但人死而心不死,他的魂灵化为生人,追随知己,把丁乘鹤的儿子教导成名,自己也中了举人,直到衣锦还乡,见到盛殓自己的棺材,才恍然大悟,扑地而灭。《司文郎》中的宋生尽管死后不忘功名,还知道自己身死为鬼;叶生科场失意,销魂失魄,竟忘其死,比宋生更进一步,从而把主人公的悲苦灵魂、抑郁心境一直写到十二分足,把读书人的功名观念写到死而不舍、魂梦相逐的地步,寓意厚重而深沉。情节虽涉荒幻,却有感人至深的力量。作品显然融合了作者蒲松龄的切身感受,字里行间充满悲情和血泪。这也是它感染力强的重要因素。叶生在回答丁公“黄钟长弃奈何”时说:“是殆有命。借福泽为文章吐气,使天下人知半生沦落,非战之罪也,愿亦足矣。”这正是作者的心里话,也是他创作此篇的重要动机。满腹经纶,文章锦绣,半生沦落,心实不甘,此篇乃先生呕心沥血“自作小传”。故冯镇峦评曰:“茫茫万古,此恨绵绵。”“满纸於邑。”③文末“异史氏曰”情同诗赋,感慨长言:“呜呼!遇合难期,遭逢不偶。行踪落落,对影长愁;傲骨嶙嶙,搔头自爱……天下之昂藏沦落如叶生其人者亦复不少,顾安得令威复来,而生死从之也哉?噫!”从这些饱含深情的文字,读者可以窥见科场的多次落榜对这位文学大家的沉重打击,以至于使他向

① 参见《清史稿》卷二百七十本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03、1004页。

② 印鸾章编:《清鉴》,上海:上海书店1985年版,第266、267页。

③ 张友鹤辑校:会校会注会评本《聊斋志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版,第83页。

往《搜神后记》所记丁令威求仙化鹤的缥缈传说①,以逃避让他苦痛难挨的现实世界。

这种题材的另一篇杰作是《王子安》。写一个穷秀才在临近发榜之时“痛饮大醉”,连做美梦,忽而中举人,忽而中进士,忽而又点了翰林,大呼长班,神气十足。最后跌下床来,惹得全家人大笑。这是一篇直写人生的现实主义小说,真实地摹绘出望报秀才那种顷刻万绪的复杂心理和如醉如痴的精神状态,可笑,可悲,而且可怜,与《儒林外史》第三回范进中举的描写有异曲同工之妙。作者虽非自觉地批判科举制,却使我们看到它对个中人物毒害之深。全篇只有四五百字,展示一个生活断面,短小精粹,生动活泼,是一篇结构精巧的微型小说。

科举给予知识分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造成的人物也是形形色色的。不仅有抑郁型的叶生,狂悖型的余杭生,还有一批程度不同、表现各异的书呆子。《冷生》中的主人公头脑迟钝,由于潜心举业,得了一种狂易病(精神病的一种)。每逢作文,必先“闭门枯坐”,而后“哗然大笑”,文思才得开启。即使身在考场,也非作此大笑不可。后来因此被学使除名。作品批评了学使的荒谬,同时也刻画一个务时文而着魔的书呆子形象。《书痴》中的郎玉柱比冷生更呆,居然相信“书中自有“黄金屋”和“颜如玉”,以至三十而不娶,等美女从书中走出来。美女真的从书中走出来后,整天教他弹琴,下棋,交游,玩耍,只不许他读书。即使如此,他还不懂“夫妇一章”是怎么回事。作品以变态夸张手法把死读书造成的痴呆性格写得笔酣墨饱,“穷形尽态矣”(但明伦评),塑造一个活生生的书痴典型。

四

在上述三类作品之外,还有一篇风格独异的《罗刹海市》。它所展示的既非现实人生,也非幽冥地府,而是据古籍虚拟的罗刹国和理想的龙宫。

罗刹国,古籍中早有记载。杜佑《通典》谓其“在婆利之东”,而婆利国“在广州东南海中洲上”。罗刹国“其人极陋:朱发,黑身,兽牙,鹰爪。时与林邑人作市,辄以夜,昼日则掩其面”。末云“隋炀帝大业三年遣使常骏等使赤土国,至罗刹”②,以证其实。本篇主人公马骥被飓风刮到大罗刹国,与《通典》所言“广州东南”海外岛国相合;“其人极陋”与本篇所言“其人皆奇丑”是同义语。加之,后世多种文献如《资治通鉴》《太平寰宇记》《太平御览》《唐会要》《文献通考》等所记该罗刹国一概抄录《通典》文字,蒲松龄易于看到。由此可知,本篇所写的大罗刹国,其原型应即此国无疑。作者的天才创造是改变其风俗,在人的容貌上大做文章。

马骥“美丰姿,少倜傥”,入梨园,号称“俊人”,让他来到“人皆奇丑”的大罗刹国,即刻被当作妖怪。因为其国风俗奇特:不重文章,而重形貌,论形貌又以美为丑,颠倒妍媸,所以做官的都是丑巴怪,官位愈高,面貌愈丑,“狰狞怪异”,不堪入目。马骥后来把脸涂作张飞,随即得到大臣举荐,国王重用。“马婆娑歌‘弋阳曲’”,又“作靡靡之音”,罗刹君臣皆当“雅乐”欣赏,“一座无不倾倒”。原来该国对乐曲的评判也是雅俗颠倒的。这种颠倒美丑、雅俗的风习,自然是作者用以嘲讽仕途科场的极端意象,令人叫绝。但它与古籍所记罗刹风俗也有可供寻觅的踪迹。罗刹人与林邑人交易作市都在夜里(如有白日交易,则要掩其脸面)。这是面貌丑陋所行的不得已之法,却也是对白日与黑夜的一种颠倒。这种颠倒对作者作出种种颠倒其风俗的处理或不无启发。

马骥后来随民众去逛海市,被龙王世子邀入金碧辉煌的龙宫,荐给极重人才的龙君,奉命撰写海市赋,大展文才,倍受龙君推宠,配以龙女,“拜为驸马都尉”,且“以其赋驰传诸海”,荣耀而归。正如前面罗刹国被用作颠倒妍媸、雅俗的科举的隐喻,后面让主人公适志奋飞的龙宫则是现实仕途的反衬,是作者追求的理想之国。而那理想国,只是蒲松龄的精神寄托,无法实现,是虚无缥缈

① 陶潜:《搜神后记》卷一:“丁令威,本辽东人,学道于灵虚山,后化鹤归辽……徘徊于空中而言曰:‘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累累。’”

② 杜佑:《通典》卷一八八《边防四》,光绪十七年(1891)浙江书局刊本。

的。蒲松龄深知这一点,因而将它安排在经过虚幻的海市才可抵达的龙宫之中。

异史氏曰:“花面逢迎,世情如鬼,嗜痂之癖,举世一辙。小惭小好,大惭大好,若公然带须眉以游都市,其不骇而走者盖几希矣。彼陵阳痴子将抱连城璧向何处哭也?”这段文字,表面上是在评议大罗刹国的怪异风俗,实是作者对仕途科举极度悲观的慨叹,是对八股取士极度灰心而失望。“嗜痂之癖,举世一辙”,说的就是八股文,当时唯有时文八股,堪称“举世一辙”,广受世俗青睐。接着借助韩愈之言,讽喻俗世评文之谬,暗指对八股的“嗜痂”之誉。下句谓罗刹国人将须眉男子当作怪物而奔逃,实指好文章无人欣赏,所以末句才说具有真才实学的考生如同春秋时期怀抱连城璧的楚之卞和向何处哭也? 由此可见,作品创作“大罗刹国”,就是用隐喻之法批判以八股取士的社会现实,嗜痂成癖,没落无望,对其整个国度的描写就是对八股取士制度最辛辣、也最绝妙的嘲讽与抨击。但它与《贾奉雉》一样,通篇未提“八股”字样,这自然与蒲公本人数十年还恋恋功名有直接关系,同时也成就了两篇不言“八股”而痛批八股的高妙作品。特别是《罗刹海市》,将时文的呆板无用之“丑”同罗刹国人面目联系起来,构思得以升华,造成新异的形象结构和多层次的艺术境界。手稿本此篇无名氏甲评曰:“《罗刹海市》最为第一。”他其实未必想到讽喻八股取士,却能看出形象结构的丰富寓意。

如果说,上述各篇揭示的是科举某一方面图景或某些人物状态,各从其类;《罗刹海市》揭示的则是当时科举的总体意象,故自成局面,独具一格。

An Incisive Criticism on the System of Official Recruitment by Examination: One of the Themes of *Strange Tales from a Carefree Studio*

Ma Zhenfa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 system of official recruitment by examination (科举) which started during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replaced the nine-rank official recruitment system (九品中正制) which had maintained the privilege of the powerful hereditary families, and became the regular recruitment system for selecting officials and talents in the later thirteen hundred years in imperial China. But some of its drawbacks emerged now and then. In the Ming Dynasty, especially after the reign of the Emperor Chenghua (成化), the selection of officials through eight-legged essay writing became a fixed form in the examination, and the system of official recruitment by examination itself also changed greatly. To a large extent, it became a tool to control the intellectuals' thinking, and at the same time served as a stepping stone for them to enter into officialdom. Living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Pu Songling (蒲松龄) who had participated in such examinations several times, saw through its numerous drawbacks and the uselessness of the eight-legged essay writing, but was still reluctant to give up his hope to become an official through writing such kind of essays. It was just under such a paradoxical psychological status, he wrote many short stories to criticize such an examination system, which became an important theme of *Strange Tales from a Carefree Studio* (《聊斋志异》). Its content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four aspects: 1) satirizing the examiners who dismissed the talented and promoted the mediocre; 2) exposing the phenomena that the examiners solicited bribes and the high-ranking officials sold official positions; 3) revealing various ridiculous mental status of the examinees under the impact of such an examination system, and 4) satirizing the hopeless examination system and mocking at the examinees who were in ecstasy on writing eight-legged essays. Through creating bizarre and grotesque images, he satirized this recruitment system in his works vigorously and incisively. Compared with the classical tales by other authors, his works are matchless.

Key words: system of official recruitment by examination (科举), eight-legged essay (八股), examiner, examinee, incisive criticism

(责任编辑　郑　园)